

第一部分

经济体制制度和稀缺

1

稀缺制度和经济行为

作为个人或是国家无论我们是多么的富裕或者贫穷，稀缺总是随时存在的。这就是说，我们所需要的超过了能够得到的。我们可以把这种状况归咎于老天，因为它给我们的资源比我们认为必须拥有的要少。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别人的过错，因为他们为了稀缺资源而与我们竞争。但正因为这样，我们都生活在稀缺的世界之中。要想得到更多的东西，就必须放弃一分别的东西。

除了稀缺以外，资源有着多种用途。这意味着为了生存，一切人类社会都必须面对和解决两个基本问题：谁得到什么和谁做什么。前一问题与已经生产出来的产品的分配有关。后者则涉及生产。这些问题是硬币的两面。但是，分别考察这些问题对分析很有帮助。一个人每得到一点东西，留给别人的东西就少了一些。每一次我们用一种资源生产某种东西，我们就放弃了同一资源本可生产的其他一些东西。

稀缺迫使我们所有的人在有限的备选对象中做出选择。出于生存的天性，人会有目的地，尽管并不总是成功地做出选择。人类历史就是我们追求更多的效用（这并不必然是更多的商品）的历

史。而且，对于决定各种选择的成本的不同情况，我们做出的反应是一致的。尽管神学家和许多哲学家强烈要求人们放弃追求更多的自然欲求，人类的欲望总是漫无边际的。一旦我们得到更多东西，我们仍然想要得到更多的这一东西和其他东西。这是与历史事实相一致的确凿的论点，并不包含道德判断。

因此，经济学的中心问题是对于资源的分配和使用做出选择的问题。一切社会的社会经济问题都有着相同的根源 稀缺。然而，由于全球各地制度结构千变万化，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在国与国之间并不相同。

随着社会集团的发展，很明显社会活动在两个层次上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社会活动的第一层是制度的发展、改进和详细规划。社会活动的第二层是在现行的制度结构之内进行的社会相互作用。前者与游戏规则相关，而后者则是指游戏本身。规则对游戏怎么玩有巨大的影响。不同的制度安排有着它们各自的激励结构，而且这些激励对人类行为有着特殊和可预见的影响。人类行为紧随其后 同时影响着资源的配置和创新的进程。由此 经济分析能够就不同的制度安排对经济的影响提供可辩驳的命题。制度对不同经济体制的研究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制度的发展旨在控制人与人之间对于资源稀缺问题的相互作用。最初 制度形成的基础是风俗习惯 包括过去的经验、禁忌、行为规范和人们对其周围的世界所形成的观点。后来，宗教和其他意识形态逐步对习惯产生了显著的影响。随着现代国家的兴起，法律和规则取代了风俗习惯。这样，制度的发展可以从稀缺的现实和人类生存的本能中推演出来。制度可以被定义为对人类重复交往所作的法律的、行政的和习惯性的安排。

制度变迁的源泉

我们对不同的制度怎样影响资源配置和创新的进程具有了更深的理解，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经济学所作的一大贡献。既然制度变迁会影响经济的绩效，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确定是什么引起了制度变迁，以及是什么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历史证据表明，制度变迁对于一个经济体制来讲既是内生的也是外生的。

内生变迁

游戏规则和游戏本身的关系是相互的。规则用特定的和可预见的方式来影响游戏，并且随之而来对应于人们新的交往机会的发展而被修改。设想一下，一个事件为个人或组织创造了在此以前被认为是无利可图的新的机会。这一事件可以是新市场的开发、技术进步，或者是相对价格的改变。无论这一事件是什么，它改变了与很多社会活动相关的成本收益比率，并且激励个人和组织去寻找和协商新的契约性协定。德姆塞茨 (H. Demsetz) 教授就这样对北美印地安部落之间产权的产生作了解释：

在毛皮贸易形成以前，狩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得到食品以及猎人家庭所需的少量的皮毛……从事狩猎完全自由，而且猎人进行狩猎并不考虑对其他猎人所形成的影响。但是这些外部性的重要性是如此之小，以至于不值得任何人去考虑它。那时不存在任何与土地私有制类似的东西……

毛皮贸易的产生具有两个直接的结果。第一，毛皮对于印第安人而言价值显著上升。第二，其结果是，狩猎活动的范围急剧扩大。这两个结果都大大提高了与自由狩猎相联系的收益。产权制度开始发生变化，这一变化要求

考虑由于毛皮贸易而变得重要了的经济效应。地理或者地区分布上的证据……表明早期的毛皮贸易中心与私有狩猎地区最早最完整的发展存在确定无误的关联。

如果通行的制度结构与环境协调较差，并且没有把这些契约包括在内，追求效用的个体会自然而然地形成改变游戏规则的压力，以便把这些新事物包括在内。这些在通行的制度安排中逐步的、演变性的变化就是为了使系统适合社会选择集合的变化而对游戏规则所作的调整。例如，14世纪欧洲人口的重新增长导致了土地相对于劳动力的增值。土地所有权带来的收益相对于其成本上升了。慢慢地，要求获得土地所有权以取代封建产权体系的压力增加了。在现代，市场扩展和技术进步使得产品的大规模生产变得更便宜——更有利可图。然而，单个企业家和企业必须集中大量资本才能利用新的机会，而所有者对债务的无限责任造成了严重问题。无限责任之所以威胁到新机会的利用，是因为它使得吸引私人资源的契约性协议的成本过于巨大。一个新的概念终于形成了：有限责任。在这一规则下每个所有者的责任仅限于他投资于企业的价值。而且，它把风险转移给了金融机构，它们在判断和评价投资机会上具有比较优势。这一游戏规则的修改促进了现代公司的兴起。

外生变迁

制度变迁也受到意识形态、形形色色的压力集团和政府关于什么对公众最有利的判断的影响。外生变迁并不是改变游戏规则以适应游戏变化了的要求，相反，是改变游戏使之适应于为某特定利益集团所偏爱的规则。例如，共同决定制是西欧一种重要的社会实践（有关共同决定制本书将在后面更多地涉及到），在这一制

① H. Demsetz, "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57, 1969, P. 352.

度下劳工代表参与企业管理。西欧的劳工组织首领、官员和一些知识分子认为，共同决定制有利于劳工，而对股东并不带来任何不利影响。但是如果共同决策对股东和劳工双方都有利，那么，为什么必须用法律来强制股东接受？为什么他们不自愿地对这一制度调整进行协商？欧洲并没有禁止共同决定制的法律。股东必须用法律强制才会接受共同决策的事实是他们受到了不利影响的最佳证据。同样，社会主义在东欧的兴起很明显是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带来的、用暴力强加的以及用恐怖来维持的。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决定制度变迁的方向？为什么不同的国家会沿着极其不同的方向以极其不同的速度演变？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对此的讨论是贯穿全书的线索。

总的来说，社会制度的变迁是对内部或外部力量作出的反应。前者改变游戏规则，让个体能够更有效地达成因为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可能形成的契约性协议。后者是由“白马骑士”凭空强加于社会的游戏规则变迁。

推荐读物：

Demsetz, H. "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57, 1967.

North, D. "Institutions, Economic Growth and Freedom," in
Freedom, Democracy and Economic Welfare (M. Walker, ed.),
Vancouver: The Fraser Institute, 1988.

S. Pejovich, "Toward an Economic Theory of the Creation
and Specific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30, 1972.

2

资本主义的兴起

我们如要想对经济体制进行比较就必须对它们的起源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我们是否把各种制度的发现归功于聪明的人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历史规律“可预见”的产物还是人类知识和技术逐步发展所带来的“非预期”的结果？本章将讨论那些促使资本主义兴起的因素。

在资本主义起源的问题上有大量文献，同时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最好的办法看来是承认每一个被浩繁的文献所提及的重要因素都在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中起了促进作用。对西欧历史的传统解释是，罗马帝国的崩溃中断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中世纪随之开始 并且从 6~15 世纪末或 16 世纪初延续了将近 1000 年。经济发展于 11 世纪重新恢复 但又在 14 世纪为黑死病所中断。

中 世 纪

罗马帝国的瓦解使以私有权和契约为基础的罗马法和贯彻它

的组织系统都荡然无存。一开始，野蛮的风俗和暴力代替罗马法成为解决相互竞争的个体和组织之间利益冲突的手段。然而，在后罗马时代的欧洲，获得、监督和执行一个人的生命和财产的权利存在高昂的费用，这导致被称为封建制度的社会经济制度逐步发展起来。

一个弱者的生存策略是依附于一个强者，把自己土地不可转让的所有权交给他以换取保护和不可剥夺的租佃权——获得地主土地的权利。领主—臣属关系逐渐演变为中世纪欧洲的基本社会制度。为臣属拥有的土地被称为采邑。一个领主可以而且经常是另一个人的臣属；亦即他同时成为比他更弱的人的领主和比他更强的人的臣属。最终，一个社会经济制度以拥有产权的个体所组成的等级体系为基础发展起来了。国王处于这一“契约”关系长链的顶端而实际的耕种者农奴则处在底端。

随着中世纪的发展，天主教会成为一个权力越来越大的组织。它在教育领域获取了实质上的垄断地位。图书馆都设在修道院和大教堂里，而绝大部分有文化的人都是僧侣。教会因此而成为储存知识的宝库。随之而来，教会取得了诠释知识、决定其使用和影响其发展方向的权力。因为没有信仰上的对手，天主教同时也垄断了宗教。

可以预见，教会在中世纪制度的发展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教会为建立在拥有土地产权的等级体系基础上的社会经济制度提供了哲学合理性、道德依据和更重要的是，宗教支持。神赐的权利是中世纪贵族拥有政治权力和社会经济特权的道德基础。国王和领主认为他们的统治权来自于上帝的恩典而不是国民的认可。这意味着中世纪世俗的统治者需要取得教会——一个充当“上帝的使者”的世界性组织——的支持。

教会的权力解释了中世纪社会生活的两大特征：（1）神学和哲学之间牢固的结合和（2）伦理学 and 经济学同样牢固的结合。中世纪的法律、习俗和社会制度在很大程度上由神学家的教导所决定。

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由教会事先决定、控制和监督。宗教生活和日常的社会生活在中世纪是不可分割的。

到 9 世纪末，这个宗教和世俗生活的合成物形成具有显著的并且明确区分了的阶级结构的封建社会。在社会阶级之间进行流动的可能性很小，几乎不存在。注定要成为农民的孩子一生都是农民。天生是贵人的孩子必将成为贵族的一员。每个人在他的阶级中是平等的，并且被赋予与其生活中的地位相称的谋生手段。

去解释和证明神学传统的号召引导着哲学和科学。哲学的角色是解释和支持神学的结论。两者之间的任何冲突都被认为是由哲学上的错误引起的。因此，中世纪哲学大体上是神学的奴婢。同样地，中世纪的经济活动由伦理标准来规范。经济活动合法性的验证所参照的是教会的道德教导而非效用。因此，中世纪教会是道德、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的最高权威。

在早期教会神父对贸易和经济的态度反映了教会的道德教育。教会承认贸易的必要性，但是警告人们这些经济活动会刺激贪婪的欲望 这对灵魂有害。因此 丝毫不令人感到惊奇 生活在基督教圈子以外的犹太人主导了贸易活动。

贪欲、高利贷和财富的积累都受到教会的谴责。对贪求的攻击在 13 世纪达到了高潮。托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和他那些被称为经院哲学家的追随者，为经济活动从总体上制定了明确的规则 并且特别提出了“公平”价格的概念。根据经院哲学家的解释，任一商品的公平价格应等同于它的生产成本加上维持卖者通常生活水准所必需的利润。应当注意的是，中世纪教会同时也担心生产和交易会扰乱封建秩序。因此，它对贪求和积累的反对并不完全出于宗教原因。货币被视为交易的非生产性媒介，而从事高利贷——对出借资金收取利息——则是不好的行为。宇宙被认为是静止的并且是由上帝来决定的。每个人在社会中有一个事先确定了的位置和为他在生活中的地位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知识的惟一目的是帮助人们理解上帝创造宇宙的意图。

大 转 变

现存的秩序势力十分强大并且对社会变迁持抵制的立场。单个的因素或事件是不可能导致它的终结的。中世纪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必须由许多因素在差不多同一时间产生影响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本节将描述一些在向资本主义大转变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社会力量。

哲学因素

自 14 世纪始，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开始受到质疑。分离的过程始于唯名论，一个为了对哲学依赖于神学的观点提出质疑所进行的早期而又初步的尝试。哲学和神学相分的观点从科学方法的发展中获得了力量。弗朗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 1561~1626 年) 大卫·休谟 (David Hume, 1711~1776) 和约翰·洛克 (John Locke, 1632--1704 年) 以及其他一些人提出了理性和知识高于揭示了的真理的观点。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人们对世界的了解。培根认为人类的完善依赖于科学的进步及其在人类生活中的应用。洛克则提出国家应当支持自然法则，在这一结构之内个体应当拥有自由。休谟为私有产权作了辩护。

笛卡尔 (Descartes, 1596~1650) 牛顿 (Newton, 1642~1727 年) 和孔德 (Comte, 1798~1857)，以及其他一些人强调了数学和科学的重要性。笛卡尔认为数学可以扩展到所有科学，包括哲学。牛顿关注的是哲学中推理的规则。孔德则认为实在的知识需要验证和试验。伊曼努尔·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18 世纪重要的理性主义者，始终强调科学的权威。

西欧这些哲学上的发展是想要通过强调逻辑思维、科学和实验来促进对世界的理解所带来的结果。这样，当时的思想家和他们

的理论彻底地背离了具有数百年历史的中世纪传统。

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对中世纪的伦理学和经济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允许贪欲，并为积累财富正了名。因此，它削弱了天主教会在信仰上的垄断地位。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倡导节俭和勤劳的生活，并且为职业道德提供了思想基础。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教导说要想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人们必须努力工作、节俭并且在其所从事的‘职业’中追求成功。很有意思的一点是，资本主义最先发展起来的地方是两个有清教徒的国家：英国和荷兰。

哲学因素和宗教改革强调理性、科学、知识、实验、勤劳、积蓄和财富积累。慢慢地，宇宙是固定的并为上帝所规定的观点为人类进步和自由意志的新思想所取代。到了18世纪下半叶，世界已经为亚当·斯密(Adam Smith)把理性时代(the age of reason)转向更好地理解经济过程作好了准备工作。

新疆域

“新的”哲学产生了新的观点。然而，欧洲的传统势力十分强大。旧秩序以及它的习俗、阶级特权和中世纪价值观都十分强大并且抵制着新思想。传统的基督教根深叶茂，无法迅速地将之改变。此外，欧洲很穷而且人口过于密集，新思想无法找到‘空间’来进行实证性试验。一句话，新思想无处实行。新疆域，主要是美洲的开发和移民则为之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实验室’。

新疆域对资本主义兴起所作的最重要的贡献是提供不受传统束缚的空间来试验新思想。从宗教约束、卑微的出身和传统伦理学中获得解放而得到的自由，使千百万人能够追求个人偏好、对个人行为负责并且在一个新的社会中创造自己的地位。一旦这些思想

应用于日常生活并且证明是成功的，他们就回到欧洲，为把中世纪人转变为现代人做出贡献。

除了为新思想的试验提供不受传统约束的空间以外，新疆域对资本主义的兴起还作了别的贡献。在 1495 年以后，在西欧和新开发领土中出产的金银里，每 100 美元中有 85 美元的金银是这些新疆域出产的。把贵金属和其他商品带回欧洲风险很大，但对于幸运的人来说，百分之一千的回报率并不罕见。这种个人冒险行为一个无意的后果就是给予新思想去展示其社会和经济效果的机会。

在早期前往美洲的人经常被称为罪犯。确实，在一个反对现存秩序、否定中世纪传统、抱怨教会在世俗生活中的角色，或者逃避君主和主教征收的赋税都被认为是罪行的时代，按照当时通行的标准，他们都是罪犯。很多定居者为了逃避这些约束而来到美洲，他们具有所谓的反叛欲望去过自己的生活，作自己的选择，并且书写他们自己的道德准则。因此，他们逃亡到了没有传统束缚的新疆域。

社会学因素

资本主义需要企业家精神，为工资工作的劳动力和积极的工作态度，而在制度意义上而言，这一切没有一个存在于中世纪。

中世纪的贵族不会提供企业家精神。他们的兴趣在于战争、政治和闲暇。对于一个贵族而言，从事商业活动、贸易和手艺是有损身份的事。他生来就是一个领主、猎手、斗士和情人。商业阶级是从小贩和工匠中产生的。这些人对贵族所享有的所有地位、特权和财富羡慕不已，并且想与农民这个更为底层的阶级划清界线。为了获得地位和影响力，小贩和工匠竭力积累财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为中产阶级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而中产阶级是企业家精神的主要源泉。

劳动力则有好几个来源。欧洲在黑死病以后的人口增长率是个重要因素。随着人口的增加，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相对于土地价

值下降了。这一经济条件的变化激励了拥有土地的特权阶级用可转让的私人土地所有权来代替把农民束缚于土地的权利不可转让的所有制。对公有制土地或公共牧场的圈占，以及其他把农民赶离土地的方法都是劳动力供给的重要来源。其他导致劳动力增加的因素有医疗保健的进步、私人军队和团体的消亡以及童工。

资本主义兴起还要求有积极的工作态度。在中世纪神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中，工人通常被称作“劳动的”穷人。在中世纪社会价值观体系中，乞求和体力劳动被认为是穷人生存的传统方式。宗教的改革引起了这一态度的改变。通过给予勤劳以强大的宗教支持，宗教改革分离了财富和生产性劳动。人们对劳动的态度成为衡量其性格和正直程度的重要尺度。

资本的形成

在供给方面，储蓄和银行信贷是可用于投资的资金的两大来源。中世纪两者都不存在。个人财富都花在教堂、宫殿、私人军队、奢侈的生活、继承人以及很多其他活动之上，但决不是用于投资。宗教改革对私人储蓄的供给有很大的影响。为了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同时也为了逃避诱惑，人们必须辛勤工作并且生活俭朴。因此，对财富积累的宗教支持为私人储蓄打开了大门。

中世纪的银行并不发放投资信贷，其主要功能是保管好存款，并把它从一个账户划转到另一个账户。中世纪银行不创造银行信用，根据已故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熊彼特 (Schumpeter) 的观点，这是意大利城市，诸如佛罗伦萨、热那亚和威尼斯不能保持繁荣的主要原因。现代银行制度的发展始于 1694 年英格兰银行的建立，并在 1797 年得到了很大的推动。英国政府于该年禁止该行以黄金支付其票据，为银行信用的快速增长打开了大门。当 1821 年金本位重新实施时，银行信用制度作为资本形成的主要源泉，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了。

综上所述，中世纪人向现代人的巨大转变导致了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制度的产生。很多因素促成了这一转变。这些因素大多不是新鲜事物。理性在希腊曾经扮演过重要角色；产权在古罗马得到了全面发展；而在中东，人们长期从事自由贸易并且享受着由此而来的收益。但只有当所有这些因素在欧洲聚集起来的时候，资本主义才得以诞生。早期的学者将这一新制度称为自由放任的制度，并且将之等同于个人主义和工业化。亚当·斯密则称之为经济自由的自然体系。他把它描述为自发的、自行促进的和自律的制度。个人自由、自由选择、自决和自行负责的思想是它建立的依据。资本主义这一名称是由马克思主义者带着伦理和社会否定意义而使用的。

推荐读物：

Gilson, E. *The Spirit of Medieval Philosophy*, New York: Scribner, 1940.

Brinton, C. *The Shaping of Modern Mind*,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1959.

Meckling, W. "Science and Religion: Evidence or Faith", Paper Presented at the 4th F. Hanyek Symposium on Knowledge, Evolution and Competition, Freiburg, 1990.

Webb, W. P. "Ended: 400 Year Boom: Deflection of the Age of the Frontier", *Harper Magazine*, October, 1951.

Weber, M. *The Protestant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Scribner, 1960.

3

社会主义的兴起

基督教神学家和社会主义者是早期资本主义最严厉的批评者。他们不接受资本主义最为重要的一个假设：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早期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是建立在教会的道德教义之上的，本章有一节将讨论早期基督教哲学家的立场。

基督教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认为，每个社会都有一个公共利益，也即体现着所有绝对社会价值终极的目标体系。因此，通行的制度安排和游戏规则必须把社会个体成员的行为引向对公共利益的追求。那样的话，社会就可以被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每个人都把个人目标放在次要地位，而且都与他人合作共同追求公共利益。

古典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公共利益。它只是那些为了追求个人目标而选择加入和退出社会的个人的自愿联合体。资本主义社会中追求效用的个体相互之间的作用会导致非预期的结果。资本主义社会的游戏规则并不是为事先确定的公共利益服务的。这里所强调的是选择规则的过程以及社会对规则的接受。如果游戏规则是公平的，其非预期的结果也就是公平的。

资本主义和基督教哲学

基督教哲学家提出了资本主义作为道德体系的合法性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基督教和资本主义在社会这一概念上的根本性分歧。资本主义的社会是一些个体的自愿联合体，他们为了追求个人目标，按照自己的选择加入和退出社会。基督教哲学家则把社会看作是其成员互相合作追求预定结果（公共利益）的有机整体。

凡是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是把人类从中世纪传统解放出来的事，基督教哲学家都视为是对道德的腐蚀和对“绝对”价值的抛弃。基督教哲学害怕自由选择并不是因为对个人自由缺乏兴趣、漠视私有权利或者对经济效率毫不关心，而是因为担心个人在自由市场中的自主选择并不一定形成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偏好集合。基督教哲学试图掩盖这一事实：自由市场并不产生偏好。可以这么说，那些对资本主义制度所允许的个人选择自由持批评态度的人，应该把批评对准那些形成这些偏好的制度——诸如学校、教会、家庭、街道、新闻、媒体，而不应瞄准只不过让这些偏好在其中显示出来的自由市场。压制个人选择自由并不改变一个人的性格。这只不过剥夺了此人作出合乎个人偏好的选择以及承担所作所为的成本，如失去朋友的权利而已。

事实上，自由市场具有强烈的道德含义。它促进个人发展，从与风险的抗争中汲取力量并且给守信以很高的评价。诚实处事的声誉是财富的源泉。在竞争性市场中，奸商、骗子和谎言家的生意不会长久。虽然自由市场不会使人变得更有道德，但它增加了不道德行为的成本。法官波斯纳 (Posner) 认为很多道德规范都满足效率要求。他写道：

诚实、可信和友爱降低交易费用……邻里和睦……
减少外在成本……仁爱会降低对高成本公共福利项目的

需求。关心则减少社会浪费。

早期 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者

托马斯·莫尔爵士 (Sir Thomas More .1478~1535)

托马斯·莫尔爵士是第一位有影响的资本主义批评者。在他的著作中他尽力把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与早期教会神父的道德说教联系在一起。

莫尔反对传统社会向货币经济的转变。他意识到世界在变化，但是又认为变化只应当在教会道德教义的界限内进行。在实践层次上，莫尔笃信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世纪哲学家和早期社会主义者把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定义为一切资源公共所有，不允许成员积蓄私产的社会。莫尔认为，建立资源的公共所有制，可以解决或者避免新兴工业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莫尔同时相信，私有产权不会有公正的政府。私有产权 他认为 会产生社会不均 而这又会导致与神律 (divine law) 相背的行为。

在莫尔心目中新兴工业社会的替代物是乌托邦。在乌托邦，农业是最重要的产业。所有公民，包括城市居民，必须在集体农场工作一段时间，对所有城市的商品供给事先加以计算，居民必须在农场按比例于所在城市所需的食物数量进行劳动。每个月每个家庭必须有一个成员把本家庭生产的商品送到市场中去。作为交换，该家庭得到可在市场上交换其他商品的票证。乌托邦中旅游不是毫无限制的，从一个社区旅游到另一个社区必须获得许可。旅游者还必须在其目的地工作一天。

① R. Posner,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86, PP. 238~239.